

边境旅游地乡村转型及可持续发展路径 ——云南打洛口岸地区的民族志研究

高俊¹, 王灵恩², 黄巧³

(1.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 广州 510275; 2.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 100101;
3.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研究生院, 广州 510420)

摘要: 边境地区是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特殊功能区, 旅游业在其乡村转型中扮演重要角色。基于民族志研究方法, 分析近30年来云南打洛口岸地区的乡村重构过程, 厘清旅游驱动下的边境乡村转型机制, 进而识别边境乡村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路径。研究发现: ① 旅游发展驱动下, 商品农业兴起, 引发以土地、资本和劳动力为核心的乡村发展要素的重大变化——土地增值、资本积累、劳动力发展; ② 传统自给农业随之衰落, 形成以商品农业为主、旅游等非农产业为辅的产业结构, 当地社区相应形成以商品农业生计为主、非农生计为辅的多元生计结构, 经济收入大幅增长; ③ 随着边民生计的变迁和生活的现代化, 传统民族界限逐渐模糊, 多民族共同繁荣发展, 国家吸纳边民为边境治理主体以应对区域内非传统安全问题; ④ 在空间层面, 耕地逐渐“非粮化”, 生态空间缩减, 集镇建设向口岸聚集; ⑤ 随着“人-地-业”的结构性变化, 打洛口岸地区朝多功能乡村发展转型, 边境乡村的地缘安全功能、文化功能和生态功能凸显。最后, 提出边境乡村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以期为边境地区的稳定与繁荣提供参考。

关键词: 边境旅游; 乡村重构; 少数民族; 商品农业

DOI: 10.11821/dljy020191139

1 引言

随着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和农业与乡村转型的持续, 旅游业成为市场经济在中国乡村地区扎根发展的重要载体, 深刻地影响着乡村可持续发展^[1]。尤其是随着乡村振兴战略、“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 旅游成为中国边境地区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重要抓手, 其发展价值已远远超出了作为一项单一“产业”门类的范畴。2015年国务院《关于支持沿边重点地区开发开放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提出, 将旅游产业作为沿边重点地区开发开放的重要突破口。可以看出, 推动旅游业发展本身不是目的, 国家战略赋予旅游业更多功能, 要将旅游业培育成为促进边境区域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途径^[2]。

然而, 乡村旅游研究长期以来过于关注旅游产业本身, 且多为经济发展导向, 缺乏对旅游和乡村可持续发展联系的深入研究^[1,3]。已有研究一般从乡村旅游一体化 (integrated rural tourism) 和可持续生计 (sustainable livelihood) 两个理论视角展开^[4]。乡村旅游一体化最先由欧洲学术界提出来, 它强调旅游作为一种乡村发展手段, 要充分嵌入乡村社会经济发展之中, 提升特定区域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的可持续性^[5]。相关学者探究

收稿日期: 2019-12-30; 修订日期: 2020-05-15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1701620, 41901162);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 (2019M653260)

作者简介: 高俊 (1990-), 男, 湖南祁东人, 博士, 研究方向为边境旅游与边境地区发展。

E-mail: gaoj63@mail.sysu.edu.cn

通讯作者: 王灵恩 (1987-), 男, 山东沂南人, 博士, 副研究员,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旅游可持续消费。

E-mail: wangle@igsrr.ac.cn

了影响乡村旅游一体化发展的核心因素,但多限于理论层面的探讨,缺乏实证研究^[6]。基于生计视角的旅游影响研究则强调在目的地社会情境之中(包括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审视旅游介入后社区居民生计的变迁^[7]。众多学者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剖析了旅游发展和目的地居民生计的联系,呼吁基于可持续生计视角来发展旅游,提升目的地的可持续性^[7,8]。不少学者认为,旅游应该对现有生计活动进行补充,而不是取代,对于边缘性的原住民社区尤其如此^[7,9]。尽管如此,可持续生计研究多聚焦目的地居民,而且偏微观^[10],因此有学者呼吁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研究应基于多利益相关主体视角不断深化^[11]。

地理学研究视角下的乡村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对乡村重构与转型的审视^[12,13]。乡村重构是由人文、经济、资源与环境相互联系和作用形成的乡村地域系统^[14]的要素重组和关系重塑,本质是一种结构变化;乡村转型则是指一定乡村地域要素重组和关系重塑催生的地域功能变化,是乡村重构的结果,本质是一种性质变化^[15]。乡村地域系统内外发展要素的相互交织和各子系统的综合作用,使乡村重构表现出综合多维性和时序演进性的特点^[16]。乡村重构包含空间重构、经济重构、社会重构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16]。社会经济重构是乡村发展转型的主线,乡村社会经济的变迁必然导致土地的利用方式和配置格局变化,从而引发乡村空间的重构^[17]。基于乡村重构和转型的内涵,有研究者指出对乡村重构和转型研究应基于要素流动、结构变化、功能演化的视角,探究典型区域、县域、镇域、村域等不同时空尺度乡村重构的空间特征和动态变化,揭示不同时空尺度乡村重构的地域差异规律和时序演化规律^[16]。然而,已有乡村发展转型研究多从宏观或中观尺度展开,村域微观尺度转型机理的探索和典型模式的总结相对缺乏^[18,19]。此外,在地理学“文化转向”背景下,在关注乡村地域系统要素变化重组带来物质空间及资源环境响应基础上,乡村社会结构转型研究有待强化,利益相关主体的行为分析也有待细化^[20,21]。

旅游业具有关联度高、综合性强的特点,是驱动乡村发展转型的重要力量^[1,22]。随着乡村旅游的快速发展,乡村地域系统的生态功能和文化功能正不断凸显^[22]。已有实证研究剖析了山岳景区依托型乡村的重构^[19,23]、大城市边缘区旅游开发引导的乡村转型发展^[24]等。但是中国乡村地域辽阔,乡村类型复杂多样,不同乡村地域之间发展条件存在显著差异,因而乡村重构与转型研究有必要分区分类分级进行,以便更有针对性地指导乡村可持续发展^[1,15]。边境地区是国家地理和社会上的边缘地带,也是不同社会系统的接触地带,这一特殊区位决定了边境地区乡村发展路径的独特性^[25]。值得注意的是,边境地区乡村可持续发展于国家的地缘安全意义重大^[26]。在全面开放背景下,旅游业于边境地区乡村发展转型的重要性愈发凸显,但以往学者过于关注旅游业本身,忽视了旅游作为一种发展手段与社会情境和其他产业的联系,对旅游发展的综合效应缺乏审视^[27]。综上,本文基于“要素-结构-功能”视角^[16],以云南打洛口岸地区为案例,分析旅游驱动下边境乡村重构过程,厘清旅游发展对边境乡村转型的影响机理,并进一步识别边境乡村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路径,以期丰富乡村转型领域的研究成果,并为类似地区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2 案例区域与研究方法

打洛口岸位于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勐海县打洛镇境内中缅边境线上(图1),距离州府景洪110 km,为国家一类陆路口岸,2018年出入境旅客131万人次。打洛镇总面积约400 km²,接壤缅甸掸邦东部第四特区,总人口约2.3万,原住民主要为傣族、哈尼族、布朗族等跨界民族。境外缅方特区由地方民族武装管辖,是传统“金三角”的一部分,

区府为勐拉(当地称为“小勐拉”),紧邻打洛口岸。受中国边境旅游政策^①影响,边境地区旅游活动多集聚于边境口岸境内外一带。本文的“打洛口岸地区”是指毗连口岸、紧邻中缅边境线的打洛和曼夕两个行政村的区域,是版纳中缅边境旅游境内旅游活动的聚集区。选择该地区作为案例的原因如下:①旅游发展相对成熟。相比中国其他边境地区,西南边境地区的旅游发展最为成熟^[28]。打洛口岸地区的旅游发展起步早,和“沿边开放”几乎同时进行,曾一度占云南省边境旅游流的三分之二,是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29]。②跨界民族聚集区。中国乃至亚洲边境地区多为跨界民族的聚集区^[30],跨界民族的发展与民族关系处理一直是边境地区稳定繁荣的战略议题。③境内毗连区域为乡村,远离区域中心城市,符合全国多数边境地区的城乡分布特征。

本文采用民族志方法(ethnographic approach),以便研究者能够在熟知案例地社会情境的情况下开展研究,从主位(emic)角度获取关于特定现象的第一手资料^[31]。因此,民族志方法的使用有助于从微观尺度上深入解析乡村发展中各主体的生产、生活、社会行为及其影响,是对地理学乡村转型研究传统客位(etic)方法的有益补充。在旅游影响研究领域,21世纪以来主位研究不断涌现,社会学、人类学视野下的质性研究逐渐流行起来,民族志方法的使用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如何”和“为什么”等相关问题^[32]。第一作者从2014年7月到2019年12月连续6年前往案例地进行了6次田野调查,寄宿在当地傣族村民家,累计时长近5个月。一手资料的收集主要通过观察、半结构式访谈、日常会话进行。总计对76名相关人员进行半结构式访谈,包括44名当地少数民族村民(表1,编号为CM1~CM44)、21名外来移民(务工、经商、投资等,多为汉族,编号为YM1~YM21)、4名不同级别(州、县、镇)官员(编号为GY1~GY4)、3名傣族佛爷(编号为FY1~FY3)、4名县城和州府旅游从业人员(编号为HY1~HY4)和1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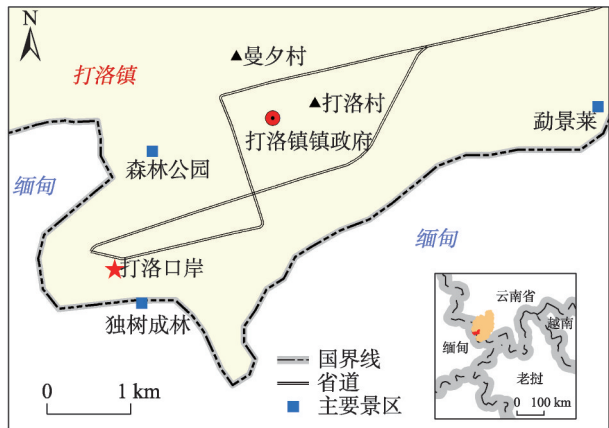


图1 研究区域

Fig. 1 The study area

注:此图基于国家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系统的标准地图(审图号:GS(2020)4619、GS(2020)4395号)绘制,底图无修改。

表1 少数民族村民样本特征(N=44)

Tab. 1 Profile of indigenous respondents (N=44)

| 人口社会学特征 | | 频次 |
|---------|----------|----|
| 性别 | 男 | 30 |
| | 女 | 14 |
| 年龄 | 三十岁及以下 | 26 |
| | 四十、五十岁 | 13 |
| | 六十岁及以上 | 5 |
| 工作 | 旅游企业雇员 | 7 |
| | 旅游小生意经营者 | 13 |
| | 农业相关生计 | 24 |
| 民族 | 傣族 | 35 |
| | 布朗族 | 6 |
| | 哈尼族 | 3 |

① 本文所指的“边境旅游”采用《边境旅游暂行管理办法》的界定,是指经批准的旅行社组织和接待中国及毗邻国家的公民,集体从指定的边境口岸出入境,在双方政府商定的区域和期限内进行的旅游活动。

相关旅游学者(编号为XZ1)。对于当地村民,访谈主要围绕地方历史文化、旅游和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生计变迁、跨境流动、族群互动等议题展开。对于外来移民,访谈主要围绕其动机、旅游和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族群互动等议题展开。对于政府官员,通过个人及单位的社会网络,联系了工作经验丰富(在当地工作11~30年),熟知地方社会经济发展、边境管控的4名官员进行了访谈,每人访谈次数均不少于2次。田野调查过程中,就日常的所见、所闻、所思撰写了46篇研究笔记,总计近4万字。此外,收集了大量地方各级政府的旅游发展规划、边境(旅游)管控政策、社会经济发展政策、年鉴统计、官媒相关新闻报道等二手资料用来补充和佐证一手资料。

对于质性文本资料,进行了描述性和主题编码分析。首先,对访谈转录文本进行了反复阅读,识别并标注了与本文研究目标相关的文字和段落。同时,逐一对当地少数民族村民和外来人口的个人史(personal history)进行归纳总结,以期更好地追踪旅游介入后当地社会经济的变迁。其次,结合NVivo 12软件,对访谈转录文本进行开放式编码,规整当地发展过程与结果等相关信息。最后,基于乡村重构与转型“要素-结构-功能”视角,结合研究笔记和二手资料等,对上一阶段的开放编码进行归类总结,提取主题。

3 研究发现

3.1 经济重构

3.1.1 从传统农业主导转向以商品农业为主、非农产业为辅的多元产业结构 20世纪90年代,边贸、旅游市场经济业态兴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出于安全考虑,关闭了原有的边境口岸,中断了与周边国家的边贸往来,这一现象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初“沿边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央政府积极放权,边疆省份纷纷重新开放边境口岸,发展跨境贸易、旅游,以期发展地方经济。在原国家旅游局发布《关于扩大边境旅游,促进边疆繁荣的意见》(1992年7月)推广边境旅游前,版纳州政府早在1991年就推出边境旅游作为一种经济发展手段。对此,州政府官员GY2回忆道:

“当时我们是以开展边民旅游为旅游业的突破口,并没有说作为旅游者去构造,我们所持有的证件都是边民通行证……(边境旅游)准确来讲是我们为了发展边疆经济,自己创新的一条路。在不违背国家政策的情况下,擦了点边球,采取了边境边贸这种形式。”

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出境旅游市场逐渐形成,但出境旅游发展仍受到国家限制^[27]。对普通人而言,当时边境旅游几乎是出国旅游唯一可行的方式。此时期恰逢版纳旅游快速发展,对国内游客而言,去版纳旅游顺便参加边境旅游颇具吸引力。与中老边境的磨憨口岸相比,打洛口岸与区域旅游中心景洪的距离更近,交通状况更优。在此背景下,打洛口岸地区的旅游得到快速发展,1991年的出境游客仅2000人次,到1994年达到20万人次,到1999年突破59万人次,旅游也因此被视为拉动地方经济的有效手段。地方政府开始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借助发展边贸招商引资开发地方旅游资源,逐渐形成了独树成林、森林公园和景莱村3个景点。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出境旅游管制的放松,中国出国旅游呈“井喷式”发展态势^[33]。在此背景下,边境旅游的吸引力骤降,版纳的边境旅游流在21世纪初也呈现连续负增长态势^[27]。另一方面,周边国家在其边境地区发展博彩和性产业以吸引中国入境旅游流,出现了“赌场围堵中国”的局面。打洛境外的勐拉城区1998年底出现了第一家赌场,截止2004年,大大小小的赌场已有56家。对此,中国中央政府

为了碾压跨境赌潮,不断强化对边境旅游和边境地区的管控。“2004年后国家出台了两个文件,一个是进一步加强边境旅游管理的意见,另一个是国家十三部委关于禁赌的,明确规定了各个部委的职责。”(GY2)2005年中央人民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暂停了边境旅游异地办证,边境旅游出境因此无法再进行。打洛口岸则早在2014年12月就暂停了边境旅游,当地称为“旅游封关”。由于版纳边境旅游长期以“出国”为卖点,勐海县对境内的核心吸引物缺乏打造,导致形成“打洛一封关,西线无旅游”的局面。整个勐海县的旅游随之遭受巨大冲击,打洛口岸地区的旅游产业迅速衰败(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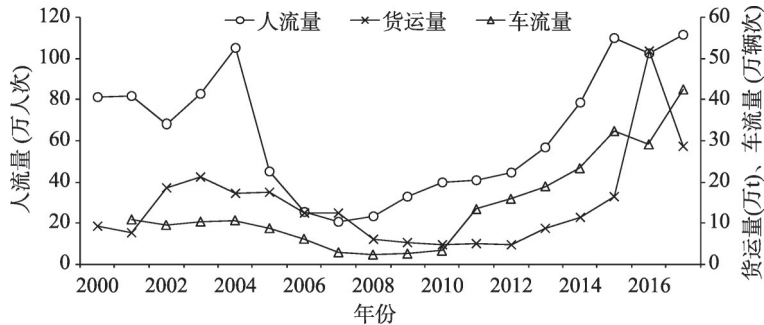


图2 2000—2017年打洛口岸的人流量、货运量以及车流量

Fig. 2 Flows of people, goods, and traffic at Daluo Port from 2000 to 2017

注:数据来源于2001—2018年《西双版纳年鉴》和2009年《中国口岸年鉴》。

虽然旅游业陷入停滞和衰退,但是旅游发展前期带来的人流、资金流、信息流极大地推动了当地商品农业的发展。一方面,一些旅游商贸从业人员、投资者,通过前期发展积累一定资本后,开始投资商品农业。这一现象在打洛“旅游封关”后尤其明显,不少人从旅游业转到农业,从事橡胶、香蕉、茶叶等经济作物种植和投资。“在这边做生意的人,看人家种香蕉赚钱,他们又开始种香蕉……我们政府的话,旅游不来了,就发展我们的主产业,利用我们的土地资源,发展茶叶、橡胶、香蕉等种植。影响大就是外来的流动人口,他们做不成了,就转个方向,或者转到德宏、老挝等其他地方。”(GY1)另一方面,不少流动人口注意到当地商品农业的发展潜力,介绍自己的亲戚朋友来此从事商品农业种植。实际上,直到目前,当地从事旅游和商品农业投资的外地人多来自湖南和四川。商品农业发展极大地提升了土地价值,21世纪初租一亩地只要200~500元,到2015年一亩地租金已上涨到2000~3000元。此种状况之下,种粮比较效益低下,地方百姓纷纷将耕地出租给外来的投资者承包种植香蕉,传统稻作农业渐趋式微。

近10年来,旅游业复兴转型,与商品农业融合发展。随着边境地区禁赌形势的好转和中国“走出去”战略、“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边境旅游项目得以重启,跨境合作得到中央政府重视。2014年《国务院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要在“一带一路”建设和区域合作大背景下,采取有利于边境旅游的出入境政策,推动区域旅游合作。边境区位优势日益受到地方各级政府重视,正如版纳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一名官员指出^[34]:“我州的优势在边、出路在边、潜力在边,必须乘全面深化改革的东风,加快沿边开放步伐……抢抓‘一带一路’和沿边金融改革试验区建设等历史机遇。”经中央政府批准,2013年底,中国边境地区全面重启边境旅游。

但是,“参与边境旅游的人越来越少,因为现在使用护照更方便……过去由于很多城市不让直接出国旅游,导致出游不便。现在的话,游客从上海到泰国很方便,那何必跑到西双版纳,再从这个边境出去。”(GY2)因此,地方旅游发展重心从境外勐拉转向境

内打洛,不再以“跨境”作为区域旅游的核心“卖点”。同时,地方政府逐步强化了对旅游发展的干预。一方面,进一步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吸引大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以大投资、大项目打造境内旅游吸引物,构建边境旅游目的地。“过去全民都来搞投资,出现了一些问题,现在的话有些产品政府反过来收购一部分,实行国有控股。”(GY2)另一方面,积极扶持当地村民从事旅游,打造乡村旅游特色村,旅游发展的“乡土性”和“民族性”逐渐凸显。例如,民族旅游村景莱村村民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废除了与金孔雀旅游集团^②在21世纪初签订的50年固定收益补偿合同,改为门票收益分成。

商品农业发展逐渐多元化,火龙果、柠檬、百香果、香水莲花等新型农业种植不断涌现,并开始“反哺”旅游发展,二者在资本、劳动力、甚至产品层面呈融合发展态势。一些村民开始自发加工、包装新型农产品作为旅游特产进行售卖(图3)。2016年在当地投资香水莲花种植的一家企业和金孔雀旅游集团利用各自优势联合打造大型乡村度假旅游项目。一名负责人透露(YM9):“旅游起来以后,以旅游带动种植经济,我们的产品会更好卖。前期可能只是把品牌、企业形象打出去,让别人知道我们卖的这个东西,是在哪里种的,有多好等等,这样我们就省去了一笔宣传费用。”商品农业和旅游融合发展的势头在外来香蕉种植大户YM6身上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YM6,1979年生,汉族,云南昆明人。1998年到打洛做导游,一直做到2004年底打洛“旅游封关”。失业后,YM6并没有离开打洛,而是选择做香蕉种植小工,逐渐学会了相关技能。2009年他开始租地,开启了自己的香蕉种植投资。最初他只租种了3.33 hm²(50亩),到2017年他的香蕉种植面积已经扩大到33.33 hm²(500亩)。然而YM6的经历并非个案,其身边也有好几个从旅游业成功转型到农业的外地人。边境旅游重启后,YM6开始和金孔雀旅游集团合作,组建团队负责营销集团的边境旅游项目,主要面向来版纳的自由行游客。用YM6的话说,“现在香蕉是主业,旅游是副业”。

3.1.2 边民从传统农业生计转向现代农业以及非农生计,经济收入大幅增长 20世纪90年代前,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一直是当地村民主要的生计方式。居住于坝区的傣族村民主要以种植水稻为生,而居住在山区的布朗族和哈尼族村民则主要以旱稻种植(轮作式刀耕火种)为生。随着旅游商贸发展,当地村民开始从事一些简单的服务工作,比如服务员、保安、民族歌舞演员,卖水果、小吃、蔬菜等小生意也开始流行起来。边境旅游发展的前20年,因为勐拉是区域旅游发展的重心,就业机会主要在境外。“现在(2015年)我这个年龄段的(30岁左右),以前好些一读完小学就去小勐拉工作。”(CM10)同



图3 村民家庭作坊制作热带果干

Fig. 3 Local home workshop making dried tropical fruits

注:作者摄于2016年4月。

^② 金孔雀旅游集团是西双版纳最大的旅游企业,由浙江的民营企业建立,2009年转为国有控股企业(占66%)。

时,大量外地流动人口涌入口岸地区,投资、工作、从事旅游商贸生意等。一些亲历者回忆道:“我是六分场农场的,也算是国营单位,父亲是从湖南支边过来的。我在单位干过,割过胶,还学过医,但后来发现西双版纳旅游业大有前景。当时也是兴下海,(1997年)来打洛是我第一次做旅游,当时我看这个地方有前景。”(YM12)“94年、95年人多起来了,外地人和本地人都经常来往。来玩也好,做生意也好……当时我当村长,传出去我要搞开发,有森林,无论哪个老板来投资、搞什么我都会批准,我们差钱,我要找钱。”(CM27)外地流动人口很快主导了新兴的市场经济业态,比如餐饮、酒店、购物店、旅行社等。但也正因为如此,之后的旅游衰退对外来人口冲击较大,对本地村民的影响则有限。

随着当地村民将土地大量租给外地投资者进行经济作物种植,本地劳动力得以从传统稻作农业中释放出来,大多数村民也将土地出租作为生活好起来的关键节点。早期许多村民给外来农业(香蕉)投资者做小工,但是近年来不少村民收回土地,投资新型农业种植,雇佣外地和境外人员。对此,镇政府官员GY1指出,“政府是思想引导,还是要靠外面的、内地的老板先过来投资,因为我们老百姓没种过也不知道,他们过来种后我们老百姓先学技术,学到以后,现在老百姓就自然而然地自己种起来了。”外地香蕉种植工人YM16说道:“寨子里就是有钱的村民种香蕉卖,本金小点的就自己种点吃。因为种香蕉种植本金要很大,去年我老板投了60多万。”实际上,到2017年左右,约一半的香蕉种植投资者是当地村民。因为勐拉地区有相对低廉的土地资源,一些村民也开始进行跨境香蕉种植。如表2所示,近年来当地村民的收入大幅增长,种植业收入在总收入中的占比大幅上升。

此外,随着区域开放开发,当地村民的就业流动性大大增强,外出谋生成为一种新的生计选择。CM33是一个典型个案:CM33,女,布朗族,1981年生。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打洛经济开发区”(当地称为“中缅街”)的一家餐馆做服务员,后来在独树成

表2 研究区域内的两个行政村经济收入结构

Tab. 2 Economic income structure of the two administrative villages in the study area

| 收入 | 打洛 | | | 曼夕 | | |
|---------------|---------|---------|----------|---------|---------|----------|
| | 2006年 | 2011年 | 2016年 | 2006年 | 2011年 | 2016年 |
| 农民人均纯收入(元) | 2570.00 | 5359.11 | 11741.00 | 2730.50 | 5225.85 | 10488.00 |
| 农村经济总收入(万元) | 2056.20 | 5768.94 | 9968.00 | 1153.60 | 1795.12 | 3156.00 |
| 种植业收入(万元) | 590.00 | 1160.78 | 6455.70 | 132.71 | 135.57 | 2126.90 |
| 占比(%) | 28.69 | 20.12 | 64.76 | 11.50 | 7.55 | 67.39 |
| 畜牧业收入(万元) | 283.00 | 1589.36 | 1136.50 | 107.04 | 99.47 | 169.85 |
| 占比(%) | 13.76 | 27.55 | 11.40 | 9.28 | 5.54 | 5.38 |
| 渔业收入(万元) | 58.00 | 157.40 | 55.80 | 3.90 | 24.79 | 0.00 |
| 占比(%) | 2.82 | 2.73 | 0.56 | 0.34 | 1.38 | 0.00 |
| 林业收入(万元) | 876.00 | 1531.37 | 460.00 | 807.80 | 1215.04 | 522.90 |
| 占比(%) | 42.60 | 26.55 | 4.61 | 70.02 | 67.69 | 16.57 |
| 第二、第三产业收入(万元) | 224.00 | 765.25 | 930.00 | 97.60 | 151.48 | 148.40 |
| 占比(%) | 10.89 | 13.27 | 9.33 | 8.46 | 8.44 | 4.70 |
| 工资性收入(万元) | 147.10 | 296.23 | 580.00 | 12.50 | 100.95 | 118.95 |
| 占比(%) | 7.15 | 5.13 | 5.82 | 1.08 | 5.62 | 3.77 |
| 其他收入(万元) | 25.20 | 77.90 | 350.00 | 4.55 | 67.82 | 30.00 |
| 占比(%) | 1.23 | 1.35 | 3.51 | 0.39 | 3.78 | 0.95 |

注:打洛村以傣族为主,曼夕村则以布朗族和哈尼族为主;数据依据云南数字乡村网(<http://ynszxc.gov.cn/S1/>)资料整理。

林景区做“模特”——穿戴传统民族服饰与游客合影。1997年，在工作时认识了一位在北京做民族餐饮的游客，之后和几个朋友一起接受了该游客的邀请前往北京工作。在北京的民族餐厅里，接受了民族歌舞表演培训，离职后在河北、辽宁一带的城市从事民族歌舞表演。在熟悉市场后，带领村民外出表演谋生。2002—2005年期间，所在村寨近2/3的村民都以在内地城市或者景区里表演民族歌舞谋生。2005年后不再外出打工，目前主要靠割胶、茶叶种植和卖旅游商品谋生。当前寨子里仍有一些村民在外谋生，主要在海南的景区表演民族歌舞。

通过对有内地务工经历村民的个人史分析发现，这些村民大多和外地人有较强的联系，这些联系多是因为外地人来打洛工作、做生意、旅游等而建立的。当地政府官员GY1透露，21世纪初由于村民开始大量外出务工，镇政府建立了外出务工流动监管体系，以防止人口贩卖问题，保障外出务工人员权益。但近年来随着旅游复兴和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外出务工人员回流现象日益普遍（表3）。对此，一名哈尼族村干部（CM42）谈及，“以前生活不富裕，哪里有工打哪里跑，不像现在生活好了，谁还愿意跑？”

表3 研究区域内两个行政村的人口特征

Tab. 3 Popul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wo administrative villages in the study area

| 人口特征 | 打洛 | | | 曼夕 | | |
|------------------|-------|-------|-------|-------|-------|-------|
| | 2006年 | 2011年 | 2016年 | 2006年 | 2011年 | 2016年 |
| 总人口(人) | 5476 | 5829 | 6005 | 2014 | 2254 | 2375 |
| 劳动力(人) | 3684 | 4093 | 3780 | 1127 | 1452 | 1398 |
| 劳动力占总人口比(%) | 67.28 | 70.22 | 62.95 | 55.96 | 64.42 | 58.86 |
| 常年外出务工人员(人) | 183 | 178 | 182 | 70 | 55 | 45 |
| 常年外出务工人员占劳动力比(%) | 4.97 | 4.35 | 4.81 | 6.21 | 3.79 | 3.22 |

注：数据来源云南数字乡村网 (<http://ynszxc.gov.cn/S1/>)。

3.2 社会重构

3.2.1 迈向多民族共同繁荣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版纳的傣族封建领主制被废除。但因为傣族世居坝区，相比布朗族、哈尼族等山地民族的发展条件更为优越。20世纪50—70年代，由于国家的“支边”“知青”政策，大量外地移民进入版纳。外来人口主要在国营农场从事橡胶种植，本地人主要在地方上从事传统稻作农业。由于农场在行政管理上与地方政府分离，因此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呈现明显的社会空间分化，交往也存在明显的界限感^[35]。

伴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大量外来人口涌入打洛口岸地区，当地居民生计方式逐渐发生转变，外来人口与本地人的社会空间分化被打破。但不少村民认为自己最多做点“小生意”，外地老板才“赚大钱”。就旅游业而言，外来移民往往掌控价值链，对于团队旅游市场而言尤甚。正如YM1所说：“如果是低价团，游客除了在路上，除了进到购物店，还能去哪？购物店要不就是有关系的，要么就是在定好的线路上的。如果是自驾游、自由行的话还好一点，游客想停哪就停哪。旅行团停都不停，你说旅游和村民有什么关系？”对于商品农业的发展，外来移民也往往是引领者和开拓者。“那些橡胶树都是从他们手上买过来的，以前我们不会搞。接芽什么都是跟他们学来的。”（CM42）因此，外地人一定程度上取代了本地人在当地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传统角色。另一方面，随着橡胶种植的快速发展，21世纪以来布朗族和哈尼族的经济状况有了显著的改善。因为二者居住在山区或半山区，拥有使用权的林地面积远大于傣族，正如一位老年傣族村民

(CM11) 所说,“前几年胶价35块一斤,布朗族拿钱买东西,钱用大袋子装。他们每家有几千棵胶树,每天割到一两千块,我们才赚几十块。”3个少数民族之间由于传统文化差异而存在的通婚禁忌也逐渐被打破。

然而,随着生计方式变迁,边民生活现代化,地方传统文化的传承面临挑战。从边民的日常生活到物质景观,现代性元素无处不在(图4)。例如,对兴建钢筋混凝土楼房,一位中年布朗族文化精英(CM34)感叹:“现在人家都盖楼房了,你还盖第三代(传统傣式民居),就跟不上人家,跟不上时代了。人家走楼梯了,你要跟着上,慢一点可以,但得努力追赶。”同样,一位外地移民(YM12)说道:“我对这个地方的历史文化很了解,有些本村的年轻人都不知道。他们的生活观念已经现代化了,你看他们的生活习惯,穿戴很时髦的。本地导游是因为工作需要,所以穿的是傣装。社会发展太快了,大环境对一些特殊的传统文化造成的影响非常大,所以国家现在花力气来拯救这些文化。”

需要指出的是,“传统”与“现代”在当地的民族旅游村寨(勐)景莱得以较好地共存。近年来随着旅游复兴,寨子里几乎每一户村民都直接从旅游中获益,比如卖旅游商品、开“傣家乐”、成为旅游公司雇员、门票分成等。傣族传统文化是其核心旅游吸引物,村民普遍对传统文化有一种较强的自豪感,南传上座部佛教在该村寨甚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复兴。

3.2.2 边境从“管理”走向“治理” 随着境外勐拉地区的博彩和性产业发展,区域内新型毒品浮现,境外“黄赌毒”负外部效应向中国境内蔓延。首先,境内外“山连着山,水连着水”,无天然屏障,边境旅游被暂停后,不少地方百姓“靠边吃边”,带人“偷渡”,一定程度上维系了非法的跨境旅游流。退任村干部YM1坦言,“很多人去小勐拉赌钱,你去赌场看看就知道了,一般要靠非法出入境,我们带一个人过去四五十块到一百块钱。这段时间(2015年10月)打击比较严,已经抓了好多人……以前我们一天最少有两三百收入,一个月就八九千到一万,你说这够不够吃喝?”一些村寨曾经利用紧邻边境线的区位优势“优势”,集体从事“偷渡”活动。实际上,一直到2015年前后勐拉地区的赌场还比较红火,不少主流媒体都做了专门报道^[6]。其次,区域内主要是跨境民族,随着边境开放开发,境内外的社会经济联系变得更为紧密。由于勐拉的经济更为繁荣,不少中方边民在勐拉工作、娱乐、经商等,年轻人沾染“黄赌毒”并不鲜见,特别是吸毒问题,一度颇为严峻。曾经在勐拉工作的村民CM2回忆道,“那时候(21世纪初)小勐拉也不管,麻黄素可以公开抽,一颗2块5,现在10块一颗。”镇政府官员GY1也透露,“为什么吸毒目前来讲,傣族多一点?因为傣族很多在小勐拉做生意,接触得太多了,一沾就上瘾。”再次,一些边民和外地赌徒为了“挣快钱”,参与运毒、贩毒等,当地一度出现“毒品村”。

随着边境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涌现,中国政府不断加大了对边境地区的管控。在管控模式上,逐渐从自上而下“严打严管”转向党政军警民



图4 民族旅游村中被掩饰的楼房

Fig. 4 A disguised modern house in an ethnic tourism village

注:作者摄于2016年4月。

“五位一体”治理模式 (GY4)。边民不再只是被管理的对象,也是边境防控的主体,基层组织建设逐渐强化。例如,为了响应云南省边疆党建长廊建设,2017年金孔雀旅游集团下属的勐景莱景区党支部与打洛边防派出所党支部、打洛村委会景莱党支部建立“警企村”党支部联建工作新模式,以期警、企、村三方资源共享、紧密合作、协调推进支部联动。随着商品农业的持续发展和区域旅游复兴,中方边民的生计和生活水平大幅改善,逐渐融入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之中,国家意识和认同得到强化^[27]。如此,以边民为主体之一的边境治理模式效能逐渐凸显,边民愈发认同边境安全管控。一位青年傣族村民CM14指出,“边境上贩毒还是有,但是现在少很多了。过去生活不好,生意也不好做。现在不一样了,你看还有公司来发展旅游。如果村民有好生活,谁还愿意去干违法的事情?”一位老年傣族村民CM20也感慨:“边境管严一点好,有毒品啊。XX寨子靠近缅甸这边,十年前(2007年)全寨子都去坐牢,20多户,以前村长都被抓了,因为村长带头过去背毒。”

3.3 空间重构

3.3.1 耕地“非粮化”,生态空间缩减 经济利益驱动下,村民从21世纪初开始将坝区耕地租给外地投资者进行香蕉种植,到2010年前后,口岸地区水稻田全部被置换成香蕉地。同样,20世纪90年代山区毁林种橡胶兴起,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进入巅峰,旱稻种植随之消失。如图5所示,“旅游封关”后打洛镇的主要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大幅增长。近年来,坝区香蕉地虫害频发,香蕉种植面积缩减,一些低海拔的山地逐渐被转化为香蕉地(图6)。自2013年来橡胶价格不景气,砍掉橡胶再种香蕉也时有发生。但是,相对单一的经济作物大面积快速铺开,大量的原始森林、次生林等遭到破坏,生态系统多样性面临挑战^[37]。村民CM15指出:“他们种香蕉用的肥料太多了,还有农药,对稻田不好,之后就种不成水稻了。”村干部CM8也说道,“现在香蕉有病了就种不成了,今年(2016年)大部分土地到期与否都要退还,地还是有人来承包,种果树或者蔬菜。”

3.3.2 集镇建设用地向口岸靠拢 1991年云南省政府批准设立打洛省级口岸,勐海县政府随即在口岸一侧征地20 hm² (300亩),着手建设“打洛经济开发区”。2007年国务院批准打洛口岸升格为国家一类口岸,地方政府随后强化了口岸通关环境和通关能力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如查验货场、公路)。2012年勐海县政府引进金孔雀旅游集团围绕口岸打造“国门界碑游”,2014年又紧邻口岸征地86.67 hm² (1300亩),推进打洛镇边境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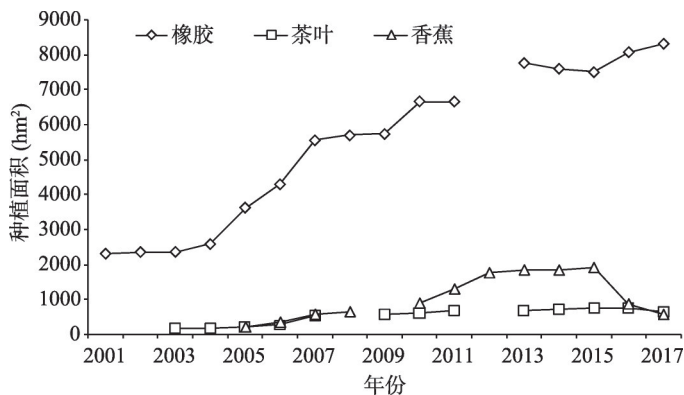


图5 2001—2017年打洛镇主要商品农作物种植面积

Fig. 5 Major cash crops cultivation of Daluo town from 2001 to 2017

注:数据来源于2002—2018年《西双版纳年鉴》。



图6 “香蕉上山”

Fig. 6 Banana plantation up in the hill
注：作者摄于2016年4月。

岸型特色小镇建设，以期发展旅游产业以及口岸商贸，提高地方非农经济比例。此期间，镇政府所在的老集镇区开发建设受制于土地产权问题^③，进展十分缓慢（GY1），老集镇区略显破败。

3.4 旅游驱动下的边境乡村转型机制

在国家“沿边开放”相关政策和国内旅游市场需求的驱动下，区域内跨境旅游兴起。伴随旅游发展，一方面大量资本、外来人口和信息涌入口岸地区，为商品农业的发展带来了契机。另一方面，旅游业和商品农业在基础设施（如交通）、资本、劳动力、产品等方面逐渐互补互融，二者呈联动发展趋势。在此情形下，旅游业的介入驱使以土地、资本和劳动力为核心的乡村发展要素发生重大变化，包括土地增值、资本积累、劳动力发展（图7）。发展要素的变化又进一步导致乡村地域系统的要素结构发生了一系列转变。在经济层面，受经济利益驱动，边民纷纷从传统粮食种植转向商品农业，当地逐渐形成以商品农业为主，旅游、商贸等非农产业为辅的产业结构；当地社区相应形成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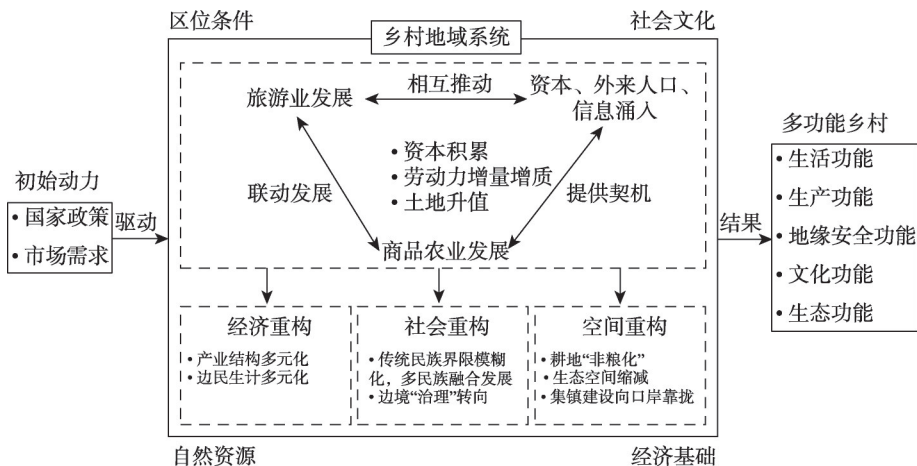


图7 旅游驱动下的边境乡村转型机制

Fig. 7 Tourism induced rur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border areas

③ 老集镇区的大部分土地产权为边境开放前的驻军部队所有。

商品农业生计为主、非农生计为辅的多元生计结构,经济收入大幅增长。在社会层面,随着边民生计的变迁和生活的现代化,传统民族界限逐渐模糊,多民族融合发展。同时,为应对境外“黄赌毒”业态引发的边境非传统安全问题,国家权力不断深入,吸纳边民为治理主体;边境治理效能随着边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得到提升。在社会经济变迁的主导下,口岸地区的土地利用结构和空间格局发生了明显变化,包括耕地“非粮化”、生态空间缩减、集镇建设用地向口岸聚集。随着“人-地-业”的结构性变化,口岸地区朝多功能乡村发展转型。具体而言,除传统的生活功能与生产功能外,乡村的文化功能和生态功能随着地方民族文化和生态资源的旅游资本化逐渐凸显。同时,随着边境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涌现和国家权力的深入,边境乡村的地缘安全功能不断强化。例如,官员GY2透露,本来版纳的边境旅游在2008年就可以恢复。然而,“当时磨丁有赌场,虽然赌场和我们的旅游团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它离我们的口岸太近了。那时候还有人告到外交部,说中国公民又被滞留在赌场,被绑架。地方人民政府要是不处理好,国家不可能批复。所以后面一直到全部赌场关闭,国务院才批准我们恢复。”(GY2)

4 结论与建议

基于民族志方法,通过对云南省打洛口岸地区的案例分析,研究边境旅游地乡村转型,得出以下结论:

(1) 在国家“沿边开放”相关政策和国内旅游市场需求的驱动下,区域内跨境旅游兴起,带动了商品农业的发展,引发了以土地、资本和劳动力为核心的乡村发展要素的重大变化——土地增值、资本积累、劳动力发展。

(2) 传统农业逐渐衰落,形成了以商品农业为主导、旅游等非农产业为辅的产业结构,边民相应形成以商品农业生计为主、非农生计为辅的多元生计结构,经济收入大幅增长。

(3) 随着边民生计的变迁和生活的现代化,区域内传统的民族界限被打破,多民族融合发展,国家吸纳边民为边境治理主体以应对区域内非传统安全问题。

(4) 土地利用结构和空间格局发生了明显变化——耕地“非粮化”、生态空间缩减、集镇建设用地向口岸聚集。

(5) 随着“人-地-业”的结构性变化,打洛口岸地区朝多功能乡村发展转型,边境乡村的地缘安全功能、文化功能和生态功能凸显。

基于对研究区域近30年来乡村发展转型的审视,提出边境乡村旅游地可持续发展路径:

(1) 以“农业+”思维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乡村旅游等非农产业。在全面开放和城镇化建设大背景下,边境口岸地区的经济发展多强调利用口岸优势,发展以商贸旅游为主的第三产业,提高非农产业比例,推进口岸城镇化^[38]。但是,口岸地区的第三产业存在较大的不稳定性,极易受到地缘因素影响,地方政府不应盲目追求产业升级。相较于其他产业,农业生产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抗冲击性。应当在夯实农业基础地位的前提下,以“农业+”,而不是“旅游+”的思维,发展乡村旅游、农产品加工业等业态,构建多元产业结构,增强地方经济韧性。

(2) 支持边民稳边安边兴边。研究指出中国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经常被地方政府和外来资本主导,地方少数民族往往被边缘化^[39]。在打洛口岸地区,20世纪90年代的市场经济业态被外来人口所主导,当地村民被动适应;21世纪前10年随着商品农业的发

展, 土地升值, 当地村民的发展能动性逐渐增强; 近10年来当地村民开始投资经济作物种植和旅游, 积极融入市场经济发展。因此, 随着地方社会经济的演化, 21世纪以来当地少数民族逐步改变了在发展中的边缘地位, 成为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主体。与此相类似, 有研究者发现在丽江地方政府和外来资本推动商品农业发展的过程中, 当地少数民族逐渐从被动的发展接受者(recipients)成长为积极的农业企业家^[40]。宏观上, 这与国家从以经济为中心到以人为本的发展模式的转变不无关系, “兴边富民”“西部大开发”“精准扶贫”等对边境社区的制度性增权一定程度上驱动了地方政府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干预, 扶持当地社区发展^[27]。在地方发展实践中, 地方政府往往通过“招商引资”、吸引外部力量发展经济, 但随着地方居民发展能动性的增强, 扶持当地居民的企业家精神和创业不失为繁荣边境经济、提升边民福祉的有效手段。另一方面, 国家权力通常随着边境地区的开发开放不断深入地方, 边境管控不断强化, 作用于边民的生产生活^[27]。因此, 吸纳边民作为边境管控主体, 发挥边民力量, 有助于提升边境安全与稳定。例如, 2015年国务院《关于支持沿边重点地区开发开放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明确提出鼓励边境地区群众搬迁安置到距边境0~3 km范围, 并建立相应的边民补助机制。

(3) 保护耕地, 加强生态环境管控。经济理性驱动下, 市场经济主体依据经济产出价值对耕地的利用方式进行选择。随着沿边开发开放, 边境地区的地缘安全功能, 特别是非传统安全功能不断凸显^[26], 国家安定需要在边境地区长期维持乡村和村民的可持续稳定生产和生活。因而地方政府要特别重视边境地区耕地的社会保障价值, 切实保护和保障耕地资源。在商品农业兴起的背景下, 一方面, 要严防耕地种植条件损毁(比如耕作层破坏), 加强区域生态环境管控; 另一方面, 强化农产品市场信息服务, 引导理性决策。

中国乡村地域辽阔, 乡村类型复杂多样, 不同区域间乡村发展条件差异显著, 本文从小尺度、多主体视角, 明确了边境旅游地乡村转型的过程与发生机理, 响应了有关学者关于地理学强化对特殊区域乡村重构的综合性研究的呼吁^[41]。此外, 基于民族志方法, 从微观尺度上深入解析了乡村发展转型中各主体的生产、生活、社会行为及其影响, 是对地理学乡村转型研究传统客位方法的有益补充。最后, 通过审视打洛口岸地区近30年来的乡村发展转型, 提出了边境乡村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期望为类似边境地区乡村乃至乡村旅游地的可持续转型提供有益参考。

致谢: 真诚感谢在田野调查、资料整理、论文修改中每一位朋友和师长的帮助与鼓励; 真诚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理论背景、结果分析、结论梳理方面的修改意见; 特别感谢中山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对本文2019年度田野调查的资助。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陆林, 任以胜, 朱道才, 等. 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的研究框架与展望. 地理研究, 2019, 38(1): 102-118. [Lu Lin, Ren Yisheng, Zhu Daocai, et al. The research framework and prospec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led by rural tourism.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9, 38(1): 102-118.]
- [2] Font X, Higham J, Miller G, et al. Research engagement, impact and sustainable tourism.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19, 27(1): 1-11.
- [3] 安传艳, 李同昇, 翟洲燕. 1992—2016年中国乡村旅游研究特征与趋势: 基于CiteSpace知识图谱分析. 地理科学进展, 2018, 37(9): 1186-1200. [An Chuanyan, Li Tongsheng, Zhai Zhouyan, et al. Characteristics and prospects of Chinese rural tourism research, 1992-2016: An analysis based on CiteSpace maps.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8, 37(9): 1186-1200.]
- [4] Gao J, Wu B. Revitalizing traditional villages through rural tourism: A case study of Yuanjia village, Shaanxi province,

- China. *Tourism Management*, 2017, 63: 223-233.
- [5] Cawley M, Gillmor D A. Integrated rural tourism: Concepts and practice.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8, 35(2): 316-337.
- [6] Marzo-Navarro M, Pedraja-Iglesias M, Vinzón L.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measurement instruments of the determinant elements of integrated rural tourism. *Journal of Hospitality & Tourism Research*, 2016, 40(4): 476-496.
- [7] Tao T C, Wall G. Tourism as a sustainable livelihood strategy. *Tourism Management*, 2009, 30(1): 90-98.
- [8] 史玉丁, 李建军. 乡村旅游多功能发展与农村可持续生计协同研究. *旅游学刊*, 2018, 33(2): 15-26. [Shi Yuding, Li Jianjun. The multifunctional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and the rural sustainable livelihood: A collaborative study. *Tourism Tribune*, 2018, 33(2): 15-26.]
- [9] Mbaiwa J E. Changes on traditional livelihood activities and lifestyles caused by tourism development in the Okavango Delta, Botswana. *Tourism Management*, 2011, 32(5): 1050-1060.
- [10] Xue L, Kerstetter D. Rural tourism and livelihood change: An emic perspective. *Journal of Hospitality & Tourism Research*, 2019, 43(3): 416-437.
- [11] Su M M, Wall G, Wang Y, et al. Livelihood sustainability in a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Hetu town, Anhui province, China. *Tourism Management*, 2019, 71: 272-281.
- [12] 李智, 张小林. 中国地理学对乡村发展的多元视角研究及思考. *人文地理*, 2017, 32(5): 1-8. [Li Zhi, Zhang Xiaolin. Pluralistic perspectives and thinking of Chinese rural development in geography study. *Human Geography*, 2017, 32(5): 1-8.]
- [13] 屠爽爽, 龙花楼, 张英男, 等. 典型村域乡村重构的过程及其驱动因素. *地理学报*, 2019, 74(2): 323-339. [Tu shuangshuang, Long Hualou, Zhang Yingnan, et al. Process and driving factors of rural restructuring in typical villages.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9, 74(2): 323-339.]
- [14] 刘彦随. 中国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 *地理学报*, 2018, 73(4): 637-650. [Liu Yansui. Research on th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new era in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8, 73(4): 637-650.]
- [15] 胡书玲, 余斌, 王明杰. 乡村重构与转型: 西方经验及启示. *地理研究*, 2019, 38(12): 2833-2845. [Hu Shuling, Yu Bin, Wang Mingjie. Rural restructuring and transformation: Western experience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China.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9, 38(12): 2833-2845.]
- [16] 龙花楼, 屠爽爽. 论乡村重构. *地理学报*, 2017, 72(4): 563-576. [Long Hualou, Tu Shuangshuang. Rural restructuring: Theory, approach and research prospect.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7, 72(4): 563-576.]
- [17] 龙花楼. 论土地整治与乡村空间重构. *地理学报*, 2013, 68(8): 1019-1028. [Long Hualou. Land consolidation and rural spatial restructuring.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3, 68(8): 1019-1028.]
- [18] 臧玉珠, 杨园园, 曹智. 大城市郊区乡村转型与重构的典型模式分析: 以天津东丽区华明镇为例. *地理研究*, 2019, 38(3): 713-724. [Zang Yuzhu, Yang Yuanyuan, Cao Zhi. Typical model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and restructure in suburban areas: A case study of Huaming township in Dongli district, Tianjin city.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9, 38(3): 713-724.]
- [19] 朱鹤, 刘家门. 山岳型景区建设下乡村聚落的多维重构: 基于云丘山旅游景区微观案例的实证研究. *地理研究*, 2018, 37(12): 132-144. [Zhu He, Liu Jiaming. Rural settlement reconstructing driven by mountain scenic spot construction: An empirical study of Yunqiu mountain scenic spot.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8, 37(12): 132-144.]
- [20] 袁源, 张小林, 李红波, 等. 西方国家乡村空间转型研究及其启示. *地理科学*, 2019, 39(8): 1219-1227. [Yuan Yuan, Zhang Xiaolin, Li Hongbo, et al. Rural space transition in Western countries and its inspiration.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9, 39(8): 1219-1227.]
- [21] 杨忍, 刘彦随, 龙花楼, 等. 中国乡村转型重构研究进展与展望: 逻辑主线与内容框架. *地理科学进展*, 2015, 34(8): 1019-1030. [Yang Ren, Liu Yansui, Long Hualou, et al. Research progress and prospect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in China: Paradigms and main content.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5, 34(8): 1019-1030.]
- [22] 屠爽爽, 龙花楼, 李婷婷, 等. 中国村镇建设和农村发展的机理与模式研究. *经济地理*, 2015, 35(12): 143-149, 162. [Tu Shuangshuang, Long Hualou, Li Tingting, et al. The mechanism and models of villages and towns construction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Economic Geography*, 2015, 35(12): 143-149, 162.]
- [23] 席建超, 王新歌, 孔钦钦, 等. 过去25年旅游村落社会空间的微尺度重构: 河北野三坡苟各庄村案例实证. *地理研究*, 2014, 33(10): 1928-1941. [Xi Jianchao, Wang Xinge, Kong Qinqin, et al. Micro-scale social spatial reconstruction of the tourist village in the past 25 years: A case study of Gouge village in Yesanpo, Hebei province, 2014, 33(10): 1928-1941.]
- [24] 魏超, 戈大专, 龙花楼, 等. 大城市边缘区旅游开发引导的乡村转型发展模式: 以武汉市为例. *经济地理*, 2018, 38(10): 211-217. [Wei Chao, Ge Dazhuan, Long Hualou, et al. The tourism-led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mode in

- the metropolitan fringe region: The case of Wuhan city. *Economic Geography*, 2018, 38(10): 211-217.]
- [25] 宋涛, 刘卫东, 李玢. 国外对地缘视野下边境地区的研究进展及其启示. *地理科学进展*, 2016, 35(3): 276-285. [Song Tao, Liu Weidong, Li L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on the border regions with a geopolitical perspective and revelation.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6, 35(3): 276-285.]
- [26] 胡志丁, 骆华松, 李灿松, 等. 地缘安全视角下国家边界的“三重功能”及其优化组合. *人文地理*, 2012, 27(3): 73-77. [Hu Zhiding, Luo Huasong, Li Cansong, et al. Triple functions of country border and its concerning optimized combination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geopolitical security. *Human Geography*, 2012, 27(3): 73-77.]
- [27] Gao J, Ryan C, Cave J, et al. Tourism border-making: A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s border tourism.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9, 76: 1-13.
- [28] 葛全胜, 席建超, 王首琨. 中国边境旅游: 阶段, 格局与若干关键战略问题及对策. *资源科学*, 2014, 36(6): 1099-1106. [Ge Quansheng, Xi Jianchao, Wang Shoukun. Development stages, patterns and key strategic questions regarding border tourism in China. *Resource Science*, 2014, 36(6): 1099-1106.]
- [29] 李柏文. 旅游“废都”: 现象与防治: 基于云南国家级口岸打洛镇的实证研究. *旅游学刊*, 2009, 24(1): 65-70. [Li Bowen. "Abolished" tourism town: Phenomenon and preventive treatment: Based on an empirical study of Daluo town national grade port in Yunnan province. *Tourism Tribune*, 2009, 24(1): 65-70.]
- [30] Van Schendel W, De Maaker E. Asian borderlands: Introducing their permeability, strategic uses and meanings. *Journal of Borderland Studies*, 2014, 29(1): 3-9.
- [31] 赵红梅. 论旅游文化: 文化人类学视野. *旅游学刊*, 2014, 29(1): 16-26. [Zhao Hongmei. On tourism culture: With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Tourism Tribune*, 2014, 29(1): 16-26.]
- [32] Ryan C, Chaozhi Z, Zeng D. The impacts of tourism at a UNESCO heritage site in China: A need for a meta-narrative? The case of the Kaiping Diaolou.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11, 19(6): 747-765.
- [33] Tse T S, Hobson J P. The forces shaping China's outbound tourism. *Journal of China Tourism Research*, 2008, 4(2): 136-155.
- [34] 马芸. 打造云南省开放行经济体制改革新高地. 西双版纳报, 2015-10-22(A1). [Ma Yun. Building the "highland" in the reform of Yunnan's opening economy. *Xishuangbanna Newspaper*, 2015-10-22(A1).]
- [35] Sturgeon J C, Menzies N. Ideological landscapes: Rubber in Xishuangbanna, Yunnan, 1950 to 2007. *Asian Geographer*, 2006, 25(1-2): 21-37.
- [36] New York Times. A border city on the edge of the law. <https://www.nytimes.com/2014/02/25/world/asia/a-border-city-on-the-edge-of-the-law.html>, 2014-02-25.
- [37] 黄巧, 施红. 勐海打洛景来傣族生计策略变迁与文化再适应. *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 2019, 11(1): 19-26. [Huang Qiao, Shi Hong. Change of Dai's livelihood strategy and cultural readjustment in Jinglai village of Daluo town, Menghai county. *Journal of Original Ecological National Culture*, 2019, 11(1): 19-26.]
- [38] 谢学兴, 秦红增. 中越边境口岸城镇化: 模式演进, 原始动力与推进策略: 以凭祥市为例. *广西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41(2): 115-121. [Xie Xuexing, Qin Hongzen. Border ports led urbanization on the China-Vietnam border: Evolution mode, original driving force,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The case of Pingxiang city. *Journal of Guangxi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2019, 41(2): 115-121.]
- [39] Zhu Y, Jin L, Graburn N. Domesticating tourism anthropology in China.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2017, 119(4): 730-735.
- [40] Yin D, Qian J, Zhu H. Frontier development in the mids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Unravelling the production of maca in Yunnan, China. *Geoforum*, 2019, 106: 144-154.
- [41] 龙花楼, 屠爽爽. 乡村重构的理论认知. *地理科学进展*, 2018, 37(5): 5-14. [Long Hualou, Tu Shuangshuang. Theoretical thinking of rural restructuring.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8, 37(5): 5-14.]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border tourism destination and i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ath: An ethnographic study of Daluo port area in Yunnan

GAO Jun¹, WANG Ling'en², HUANG Qiao³

(1.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2.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3. Graduate School of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420, China)

Abstract: Borderlands are margins of nation-states where different social systems mee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orderlands are becoming strategic points and forefronts for China's "opening-up". With the deepening of China's opening-up, tourism industry is now considered an important driver for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t China's border areas. Drawing on ethnographic fieldworks conducted during the period of 2014-2019, this study identifies the features of rural restructuring in Daluo port area of Yunnan on the China-Myanmar border, and unravels how tourism has affec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rea. Findings show that along with tourism development, cash crops plantation emerged, which led to significant changes in rural development factors, including the surge of land value, increase of capital, and development of human resources. This saw the decline of traditional self-reliant rice agriculture, and the formation of a market economy dominated by cash crops plantation, supplemented by non-agriculture sectors such as tourism. The border people thus turned to cash crops plantation and non-agriculture sectors for livelihood, which resulted in significant income growth, and their pursuit of modern lives. This, in turn, helped dissolve traditional ethnic boundaries in the area, where all ethnic groups integrated into China's national development. With the emergence of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problems, the Chinese state increasingly enhanced its presence at the border, and started to involve the border people in border governance, which reflected that the socio-economic transformation, land use and its spatial pattern changed significantly, including agricultural land for non-food crops cultivation, decrease of ecological space, and conglomeration of town construction land around the port. With the structural changes related to "people-land-industry", geopolitical security function, cultural function, and ecological function of the rural border have become evident, and the rural border developed towards multifunctional countryside.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is study identifie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aths for rural border tourism destinations. These paths include following the "agriculture +" vision to develop agricultural produces processing sector, rural tourism, and other non-agricultural sectors, supporting border people in borderland governance and development, and protecting the agricultural land and monitoring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and comprehensive impacts of tourism in China's borderland.

Keywords: border tourism; rural restructuring; ethnic minority; cash crops plantation